

此去不缘名利去 万里归心对月明

——忆吴文藻先生

□ 徐 平

神奇的笔记本

2016年夏天，我要去西藏墨脱作社会学人类学调查。路经拉萨时，巧遇一位学识渊博的老领导，校友丹增伦珠博士热心张罗，新朋友老友在八角街弯曲巷子里的森苏大院藏餐馆聚会。

酒酣茶醉之时，西藏图书馆的努木馆长，拿出一个黄布精细包裹的东西——就像西藏传统经书的包装一样。他小心翼翼地层层打开，显露出一个浅褐色的硬皮笔记本，封面是一只飞翔的鸽子。封页细密工整地写着《实践论》《矛盾论》的学习心得，红笔加方框标注着“唯物辩证法札记，吴文藻1958年3月初立志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笔记本，1960年9月7日再立志记”。这是解放初期的高级笔记本，前面是毛泽东、朱德的标准照片。笔记本右上角注明了页码，一直编号到49页，实际记录到32页，清秀工整的字体，全部抄录和记载的是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心得，还有一张1958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艾思奇的《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的剪报。

吴文藻，就在这么一个奇特的空间和时间里出现在我的面前。努木1993—1997年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学习，来自西藏农村的他家境贫寒，偶然在垃圾箱边发现的这个笔记本，本是想做读书笔记。当他看到吴文藻的大名后，立即精心地收藏保存了起来。他说：“我一直在找一个最合适的人，来收藏保存这个笔记本，今天我把他送给你！”因为我也中央民族大学的毕业生，更因为我的老师费孝通是吴文藻先生的得意门生，于是这本吴文藻的学习笔记，在奇妙的巧合机缘中传递到我的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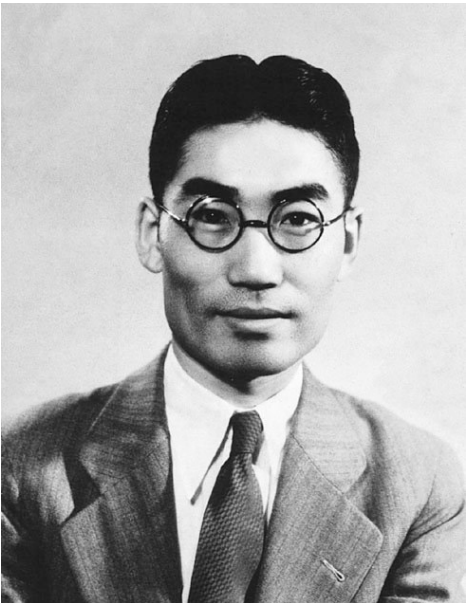
冥冥之中，我感觉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将我拉回到学科发展史里。1979年9月，我从四川省汶川县的大山里，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学习。作为一个17岁的少年，一切都新奇而懵懂，只知道历史系有辉煌的历史，一直名人荟萃。我们的任课老师多是他们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听说过吴文藻，也依稀见过他与夫人冰心每天傍晚的散步，但离我有着跨时代的遥远。看着这本古旧的笔记本，感觉学术的血脉传了过来，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日益厚重。

学术救国的践行者

1901年4月12日，吴文藻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夏港镇。父亲与人合开米店。吴文藻5岁发蒙，小学中学表现突出，得到老师厚爱指导，1917年他16岁时直接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学堂为官办留美预备学校，不仅免费读书，而且照搬美国教材教学，使吴文藻打下坚实的现代学科基础。

1919年的五四运动，吴文藻参加了清华的游行，更受到进步人士和书刊的影响，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读书的大问题。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而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首先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文化，以学术改造来振兴中国。

1923年吴文藻如期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



►他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个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

►“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使他自己成为一个名重一时的学人在文坛上独占鳌头。他着眼的是学科本身，他看到了他所从事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处境、地位和应起的作用。”

茅斯学院社会学系学习。吴文藻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学习美国的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博览群书，广泛选课。他对西方政治思想和工业化及经济制度发展格外留心，甚至选修过《社会主义运动史》课，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及列宁的一些著作。1925年夏吴文藻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学习，更加广泛地涉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生物学、化学等众多课程，还挤出时间学习了法文和德文。

“以学术研究为祖国服务”是吴文藻留学的信念。他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力求将学术研究与祖国需要相联系。仅仅在哥大学习一年以后，1926年吴文藻就以《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学说》的毕业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同年，他还发表了《民族与国家》，这是吴文藻第一篇重磅学术论文，“民族者，里也，国家者，表也。民族精神，实赖国家组织以保存而发扬之”。他试图将东西方的学术概念糅和在一起来认识和解读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这反映了他宏大的学术抱负和学术视野。

两年后的1928年冬，吴文藻撰写了《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的毕业论文，次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并荣获哥大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吴文藻决心选择社会学和人类学为终身专业，想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研究，提出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状态的合适方案。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吴文藻在博士学位尚未公布的情况下，于1929年2月回到了祖国。

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同时聘请吴文藻当教员。吴文藻因为深爱的冰心，选择了燕京大学，答应同时为清华兼课。

推动社会学中国化

社会学是在上个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舶来品，最早在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展开。教师、教材、教法甚至最早的中国社会调查，几乎都是外来的。1922年济时聘请6名美国人创办燕大社会学系，1926年许仕廉接任系主任，倡

导讲授中国的社会学。吴文藻加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担任起“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等三门课，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有感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吴文藻首先为每一门课都编了一种汉文教材，并且加入中国的材料和研究内容，每年都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

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学中国化，吴文藻在出国留学的深厚积累基础上，不断追踪国际学术最新发展，首先系统介绍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学、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和典型学派。从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到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社会学中国化》，都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吴文藻付出巨大心血所撰写的这些文章，为社会学中国化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他从《文化人类学》概念入手，依次撰文介绍《现代法国社会学》《吉丁斯的社会学学说》《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文化表格说明》《印度的社会与文化》等。在充分吸收国际学术成果基础上寻找社会学中国化的切实途径。

然后是引进来，邀请世界著名学者到燕京大学讲课。1932年69岁的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走上了燕大课堂，一头白发的他第一句话就是：“在这门课程里我不是来教你们怎样念书，而是要教你们怎样写书。”一下子让中国学生脑洞大开。费孝通1998年88岁高龄时决心在学术上重新补课，用的就是吴文藻遗赠的帕克的两本书作教材，花了两年时间写下长篇《补课札记——重温帕克社会学》，深情回忆帕克来华故事及其深远影响。吴文藻专门为燕大师生编辑的《帕克社会学论文集》作导言，系统介绍了帕克的学术成就及芝加哥学派，特别有感于帕克“成功不居，提拔青年，鼓励后进”。

1935年吴文藻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更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主张。他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个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吴文藻先生把此概括为“社区研究”。他专门增设“社区调查”“社区组织及问题”两门课，先后撰写了《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

区研究计划的商榷》。1935年邀请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拉德克里夫-布朗来华讲授“比较社会学”和“社会研究”，吴文藻撰文介绍《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燕大社会学系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结构功能学派的中国研究中心。

再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吴文藻认为“以试用假说始，以实地试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他主张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并认为这种做法与中国国情最为吻合，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就是要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情况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学校，虽暂时未受影响，但吴文藻一家无法在北平继续亡国奴的生活。吴文藻受聘云南大学并建立起社会学系，担任系主任，同年又受燕京大学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吴文藻离开后由费孝通主持工作，在社会学史上留下了著名的“魁阁精神”。

1940年吴文藻到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对边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参加了对西北边疆的实地考察。早在1933年他曾经到内蒙古调查，撰写了《蒙古包》一文。各民族团结抗战，让他更深刻认识到民族与国家的重要关系。他提出“边政学”这一概念，并撰写长文《边政学发凡》，指出：“所谓的边疆现代性，就是对于边疆文化，因势利导，使之与中原文化混合为一，完成一个中华民族文化，造就一个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国家”。

开风气育人才

吴文藻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更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教育家。吴文藻认为一个学科的发展，只靠少数人的努力不成，只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在吴文藻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他为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事业培育了第一批人才。吴先生门下的“四大弟子”，即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瞿同祖，他抗战时期在昆明和成都培养的一大批学者，都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的成就。

《开风气，育人才》一文，是费孝通199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成立10周年时的讲话，他强调这次会议同时是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10周年。“这两件值得纪念的事并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条江水流程上的汇合点。这条江水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流程，北大社会学研究所的成立和后来改名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还有吴文藻老师一生的学术事业都是这一条江水的构成部分，值得我们同饮这江水的人在

一片冰心在玉壶

□ 包路芳

吴文藻与冰心的爱情，可谓因错过结缘。1923年8月17日，美国邮轮杰克逊号，从上海启程开往美国西岸的西雅图。这艘船上云集着风华正茂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仅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就有100多名，还有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美女作家谢婉莹。这位23岁的才女，以冰心的笔名已经发表诗集《繁星》和小说《超人》，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

冰心贝满中学时的同学吴梅梅，来信拜托照照同船的弟弟吴卓。船行第二天，冰心请同学许地山帮忙寻找，他却热心地从清华的留学生堆中，找来了一位温文尔雅、虽姓吴却名文藻的瘦高男子。这个美丽的错误，开启了吴谢的终身之旅。吴文藻朴实无华，谈起文学却一口气列举几本著名的英美评论家的著作，问得冰心哑口无言。他直言不讳地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一席话刺痛了那颗孤独的心，虽在横渡太平洋两星期的光阴中两人再无交结，爱的种子却已悄然埋伏。

船到美国西雅图，留学生们互留地址各奔东西。吴文藻节衣缩食地爱书买书，每逢买到一本文学书，看过后就寄给冰心，而且在有关爱情描写部分画上重点。对这种另类表达方式，冰心其实心有灵犀。她收到书就赶紧看，看完就写信报告读书心得，“像看老师指定的参考书一样的认真”。双方的学问在增长，爱情也随之增长。

入学两个多月后，冰心因病住进了沙

穰疗养院，吴文藻乘七八小时火车前来看望。1925年春，冰心和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为美国朋友演《琵琶记》，冰心随信寄去一张入场券。吴文藻先说功课太忙不能来，但第二天却意外地出现在她面前。美丽的夏天，冰心到康奈尔大学的暑期学校补习法文，意外发现吴文藻也在这里补习法语。两人几乎每晚从图书馆出来，就坐在石阶上闲谈。两年的信画往来，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出现，有一天在湖里划船的时候，“老实”的吴文藻终于吐露爱的心声。

1929年2月，吴文藻博士毕业回到祖国，受聘燕京大学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课。他们南下上海、江阴拜见了双方的父母。回到北京后，6月15日是星期六，吴谢在燕大校园美丽的临湖轩，请来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举行了一个简朴而热闹的婚礼，仅用34元钱买来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新婚之夜他们是在京西的大觉寺度过的，找了一间空屋，除了自己带去的两张帆布床之外，屋里只有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另一只脚是用砖头垫起来的。简单，却别有文人的浪漫。

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十年间，吴文藻把全部精力用在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事业上，冰心则承担起家庭的所有家务，特别是三个可爱的孩子相继来到世上，还要照顾两边亲戚的生老病死，维系复杂纷纭的社会关系。冰心深有感触地写道：“一个家庭要长久地生活在双方人际关系之中，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儿女，还要奉养双方的父母，而且还要亲切和睦地处在双方的亲、友、师、生之中。”吴文藻的严

谨、认真、朴实与冰心的细腻、周到、热忱相得益彰，吴家经常高朋满座、师生欢聚一堂。

生活并不总是美好，但苦中仍旧有乐。1937年抗战爆发，不愿当亡国奴的吴文藻夫妇，等最小的孩子吴青出生后，立即绕道奔赴大后方昆明。吴文藻应聘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又创办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全家搬到昆明郊外的呈贡，住在华氏墓庐。冰心受聘担任当地中学教员，将那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默庐”。1940年吴文藻到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全家又搬到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买了座没有围墙的土屋，冰心又将其叫作“潜庐”。每座房都伴有一篇美文，还有歌乐山小橘灯的故事，表达出冰心的乐观善良。

1946年吴文藻赴日本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冰心受聘东京大学教授文学，全家团聚日本其乐融融。他们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也拒绝了美国大学的邀请，毅然在1951年历经艰难返回祖国。1953年吴文藻正式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冰心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全家搬到民院家属院的和平楼居住。大儿子在清华学建筑，两个女儿听从周恩来总理建议攻读英语专业。1957年反右运动风起云涌，儿子吴平、冰心三弟谢为楫，接着又是吴文藻相继被错划为右派。

十年“文革”中全家八口人（包括三个子女及其配偶）分别在八个地方，70岁



的吴、谢还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种棉花。吴家终于挺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冰心深有体会地说：“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限’，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教育出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女儿。”

改革开放以后，1983年他们搬进中央民族学院新建的高楼新居，窗户宽大，阳光灿烂。书桌相对，夫妻俩终日隔桌相望，各写各的，不时有熟人和学生来访，说说笑笑，享受着人间“偕老”的乐趣。1985年7月3日，吴文藻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一直昏迷不醒，在9月24日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冰心又独自在这套窗明几净的房子里，

慢慢地回忆，宁静地书写。“人活着一天，就有一天的事情”，她的《我的一天》记录下一位智者的豁达和充实。1999年2月24日，百岁的冰心老人安详地永远睡着了。她的骨灰和吴文藻的合葬在一起，2002年10月21日安葬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的“中华文化名人雕塑纪念园”里。

冰心说：“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在平坦的道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围有和暖的春风，头上有明净的秋月。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畅的“琴瑟和鸣”的音乐。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